

# 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大学文化治理 ——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张继明, 余 敏

**摘 要:**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表明, 大学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决定了新的制度设计能否获得充分的合法性基础。我国大学文化存在官僚主义文化、狭隘功利主义文化、工具理性主义文化和特殊的熟人社会文化等诸多负向的文化样态, 导致现代大学制度理念难以顺利转化为制度实践, 这就要求加强大学文化治理, 建构新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治理应遵循“尊重大学逻辑、追随时代特征、立足中国特色”之原则, 当务之急则是树立学术本位主义大学观, 复兴家国情怀, 强化法治思维与程序公正意识,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新文化的建构将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大学制度创新, 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文化; 文化治理;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4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7)05-0149-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05.015

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及其战略转型, 乃至在未来的持续发展, 都要求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但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历程发现, 现代大学制度在理念上逐渐达成共识, 但制度理论向制度实践的转化则存在困难。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高校“去行政化”, 国家通过简政放权不断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 各大学也分别采取了诸如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建立教授委员会等举措来限制行政权力, 但最终大学行政化依旧尾大不掉。值得深思的是, 缘何理论上被确证的制度设计难以转化为制度实践? 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明确回应, 现代大学制度探索不能取得突破, 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就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笔者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出发, 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 一、重温北大改革: 文化建构与制度改革的剥离

从 20、21 世纪之交始, 伴随着大众化的来临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号召, 大学制度改革迫切要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探索过程中, 2003 年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可谓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 北大改革集中反映了扩招时期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 其二, 北大改革深刻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大学与市场、国际化与本土化间的冲突。至今我国大学制度改革都未曾走出当时北大所处境地。是故, 分析当年北大改革失利的背后, 具有很大价值。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休克式疗法”被视作改革失利的重要原因<sup>[1]</sup>, 此外, 过度市场化、官僚主导下行政权力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建构问题研究”(EIA140399)

作者简介: 张继明, 教育学博士,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山东 济南 250022); 余敏,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湖北 武汉 430074)

的傲慢、与国际接轨中的“洋泾浜”取向等多重因素亦导致改革陷入困境,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文化因素,即价值认同的冲突。

其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体制改革范式是温和式、渐进式的,“软着陆”成为各领域改革的共同标准,“平稳而中庸”成为指导改革的内在规范,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高等教育改革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何改革开放之后的高等教育改革不再大开大合,而北大的休克式疗法显然与此种文化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道中庸”作为深刻影响国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传统,从最深层面决定了北大的极端化改革难获基本认同。其二,中国人尤其是熟人、近人之间讲求相安无事,崇道和谐,因而有学者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出发,认为和合文化是探索中国大学模式的重要视角<sup>[2]</sup>。现实中,中国的熟人文化也确实深刻影响着大学的运行秩序。北大改革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以高度竞争为手段,以末位淘汰为目的,与讲求和谐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注重人情的大学文化样态极不相符。其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式,是一个兼具组织生产、利益分配和进行政治生活的功能统一体<sup>[3]</sup>,单位的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对于单位人而言这种稳定性意味着职业的安全,“铁饭碗”就是此意;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人吃“国库粮”,这正是广大农村家庭子女读书改变命运的希冀。大学作为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延续着计划体制下单位主义的结构与文化。北大改革要打破教师的铁饭碗,与大学根深蒂固的单位制文化是不相容的。其四,民主和科学是北大的传统,教师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清醒的独立和民主意识。而北大改革不仅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本位,还因为缺乏基本的民主讨论而导致程序的非正义。所以反对者质问为何改革首先拿教师“开刀”,并尖锐地指出北大最应该“革命”的是行政系统;同时,他们对于其在改革设计中的缺位也表示强烈不满,所以北大在第二次公开改革方案之前,进行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被称作“一个商议性民主参与的例证”<sup>[4]</sup>。其五,作为知识分子,我国大学教师在总体上遗传了古代“士”或“君子”之风,对人格的尊严和生活的体面、优雅有着高于一般人的要求,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们对于尊严、体面保持着极为敏感的神经。在北大改革中,行政系统一再表现出权力的傲慢,这本身就是对教师群体的一种精神压迫,改革设计者不加修饰地将教师群体贬为“二流”,更严重伤害了他们自尊和自信。所以,北大教师对改革的激烈反对体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诉求。其六,北大改革中表现出的市场化取向、行政本位或官僚主义、民主缺失等,与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本质与精神发生冲突,对学术本位的大学逻辑、教授治校的治理理念和“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的文化气质造成了戕害。

综观以上六点发现,对渐进式的改革范式的认同、以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及大学的熟人生态、根深蒂固的计划体制思维、北大的深厚的民主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强烈自尊及崇尚独立的大学精神、学术本位的大学逻辑等,共同表征为一种文化,深刻影响着这场改革。北大改革是一场权力间的博弈,但在更深层面上是一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改革在最终意义上是一个建构新文化的过程,因而制度设计必须观照文化,尊重文化传统及其嬗变的规律。在北大改革中,制度变革脱离了文化建构,文化传统的深层拒斥最终导致改革失利,显然这种文化拒斥效应普遍存在于我国大学制度改革之中,正因如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专家张应强教授才强调,大学制度创新必然是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的<sup>[5]</sup>。

## 二、理论分析的视角选择: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大学改革其实是一个文化命题,那么大学文化是如何影响到制度变革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适切的分析工具。该理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化模式、移民政策、公司培训、技术传播等领域<sup>[6]</sup>。清华大学罗燕博士在对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中指

出,新制度主义理论突破了旧制度理论的边界局限性,与我国正经历着的教育制度变革更具有理论上的相关性<sup>[7]</sup>。在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绩效管理、组织变革及教育公平等研究领域,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充分观照文化认知因素的理论特质,本文选择该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我国大学文化治理。

传统制度理论主要关注以规制性要素为主的正式制度,认为制度是解释社会、经济行为的外生变量,如迪尔凯姆认为制度是围绕社会功能的实现而产生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某个领域内的体系化。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往往暗合了旧制度主义的范式,即通过顶层律令来建构制度体系,通过政治或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实施。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改革范式是有问题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不力及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屡现困局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则开始关注非正式的规则、程序及惯例等对于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sup>[8](P196)</sup>。马奇、奥尔森明确指出,习俗、信仰等对社会具有约束作用,能够“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显然,在漫长的大学发展史中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并早已内化于人心的非正式规则,实际上在发挥着重于正式规制的影响,所以在很多时候,真正有资格为大学立法的是大学自己,而非外在权威。张楚廷先生就认为:“大学并不是依法规而按部就班的,否则很可能接近平庸”,“当某种机遇来到的时候,不仅要及时调整大学目标,必要时还需调整法规”。我国大学里的“人情文化”、“面子文化”、“中庸文化”等尽管与一个学术共同体应有的文化样态并不相符,但却深刻影响着大学运行,因为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最深层的。

在正视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斯科特更加明确地将制度概括为由符号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持久社会结构,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这一界定凸显了文化—认知要素,“关注制度的文化—认知性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sup>[9](P56)</sup>。此处之文化认知要素是指处于某种文化环境或持有某种文化认知图式的群体对新的制度及制度变革的认同情况。可见,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倾向于把文化本身界定为制度,从而弥合了组织、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裂痕,体现出新制度主义的先进性。这个由符号、脚本和惯例等构成的制度世界,在影响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想象和具体偏好的基础上,建构或约束人们的行为,促使形成了稳定的正式、非正式的规制系统。由此进一步看出,如果说“制度的早期理论研究者主要关注固定的制度以及它们对组织的影响”,那么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关注制度过程,即“制度是如何出现并获得稳定性、合法性、拥护者的”<sup>[9](P103)</sup>。这对于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困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文化因素是如何阻遏现代大学制度实践的、我们又应如何从文化治理出发来寻求大学制度创新。

合法性及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所谓合法性是指制度设计既符合正式的国家法令规章,又符合组织内部约定俗称的规范规则和人们的文化认知结构。只有具备合法性,制度设计才可能转化为制度实践。而旧有的制度体系若不能随着环境及文化认知结构的变化而做出有效调适,将会遭遇合法性危机,危机的本质即制度与文化间的分离或新文化对旧制度的拒斥,由此就产生了制度变革的要求,这是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而新制度的确立,正是经由文化选择而取得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北大在改革碰壁后进行了一系列补救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为新制度建构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如今,当年北大改革中争议最大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经在很多高校悄然实施,从文化分析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在国际化、市场化背景下,这种高度竞争机制与人们的文化认知间的冲突趋缓。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仍决定了高校在实施此制度时仍存在一定的妥协<sup>[10]</sup>。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启示就是,制度设计与大学里的文化结构相冲突,新制度难以嵌入人们的文化认知图式,从而受到深层抵制。这种冲突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制度设计不符合大学组织文化。例如,官僚主义同独立、自由的大学文化是根本冲突的,大学“去行政化”不存在任何商讨余

地；过度的市场导向、极端的绩效管理与学术共同体文化亦不相符，在给大学带来即时效益的同时也深深伤害了大学。二是好的制度设计遭遇特殊的文化样态，要么须加以改造，要么难以落实。例如，洪堡大学理念使德国迅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但美国大学在学习德国时对其进行了改造，从而奠定了美国大学称雄世界的基础，而这背后是美国特殊的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文化在起作用；美国非升即走的竞争机制促进大学教师的必要流动，但在中国大学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是源于大学传统的排斥；发挥大学章程的治理功能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普遍做法，但目前我国大学章程被诟病为“花瓶”，是因为我国大学法治文化缺失，人们更加信赖甚至迷恋人治和权力。因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采取制度改革的文化路径，建构新大学文化，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综上，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揭示了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屡陷困境的深刻缘由，同时也启示我们高度重视文化治理在大学制度改革中的根本性意义。

### 三、文化的现实：负向的文化样态阻碍大学革新

我国大学的文化生态极其复杂，一些与大学组织要求相悖的文化样态造成了传统大学制度的危机，又在最深层面拒斥着现代大学制度的落实。其中，官僚主义文化、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工具理性主义文化和熟人社会文化是目前深刻影响我国大学制度创新的四种主要文化样态。

#### （一）官僚主义文化

“行政化”是阻碍我国大学改革创新的痼疾，官僚主义正是行政化的集中反映。官僚主义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定势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是科层模式消极因素的强化。官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官本位的，行政官员通过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进行全面控制，尤其是通过掌握资源配置和学术评价的决定权，行政层位居大学权力系统的顶端，并导致行政管理层和以师生为主体的基层群体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形成了大学内部优势、弱势群体间的“阶层鸿沟”。在此背景下，大学主政者常常在缺乏基层调研的情况下，片面依循政治或行政原则管控大学，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不高；正是在“管理简便”原则和政绩观影响下，行政层制造出密致的管理机器，通过严格的控制和评价来追求最大绩效，而这种绩效往往同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和学术组织的本来使命极不一致；行政层还通过强势的权力控制来占有最大化的福利，所谓行政权力的僭越在本质上是权力扩张下的利益之蚀。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教师由大学的主人沦为二等公民，甚至成为唯行政马首是瞻的仆役。权力的压制、管理主义与绩效主义的枷锁和身份的矮化，使得大学教师既缺少体面的生活，也缺失知识创造的自由空间，难以建立起学术本位的价值观。

#### （二）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

人们常常批判功利主义是大学堕落之源。现实中人们对大学的“功利主义”之评判，主要是指大学过度追求物化的指标，例如各类资源、项目的获得以及财政收入等，而与此同时却忽视其追求真理、教书育人、塑构社会先进文化之天职。这一批判显然有其现实基础，但简单批判也可能忽视了一个现实，即现代大学对资源的依赖性及其追求物质基础的正当性。实际上哲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本来就内含着一定的“进取性”<sup>[1]</sup>。本研究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大学“功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不仅对物化指标具有极大热情而忽视精神追求，还讲求利益的实在性、即时性，忽视长远目标及科学规划的价值，是急功近利的。在这种实利主义观影响下，大学与师生少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高度和使命感，而凸显“理性人”、“经济人”之角色。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其“狭隘”之处还鲜明地体现在

鲜明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上,把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学术职业或学习仅仅视作“为稻粱谋”,沉迷于当下的欲望,缺乏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视野和可持续发展的智慧。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导致大学充斥着市井化甚至市侩化的氛围,腐蚀着大学超拔、濯然的精神气质,成为束缚大学立德树人和学术创新的桎梏。

### (三) 工具理性文化

批判理论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指出,工具理性使人陷入了一个自我奴役的世界。马尔库塞亦指出,人们对科技功用的膜拜和对征服自然的狂热压抑了人的主动性和真正价值所向,人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成为发达工业文明中“以一种物而存在的纯粹形式的奴隶”<sup>[12](P3)</sup>。当前我国大学充溢着浓重的工具理性主义气氛,如:政府过度强调大学的政治经济功用,为此对大学不当干预,大学失去了作为一个文化性、价值性存在的尊严;大学管理者过度追求物化指标,以此作为校内资源配置和管理决策的依据,作为院系评价、教师评价、教学和科研评价的标准,使得大学人格培育、追求真理和传创文化的责任持续弱化;教师在迎合物化评价制度中,价值取向呈现显著的物化、经济化特征,“师道”和“尊严”荡然无存;学生将求学视作职业准备,沉迷追求各种谋生技能,“读书无用”思想蔓延。教育及大学从本质上说是人通往自由、解放与幸福的路径,人本身才是目的。但在工具理性文化影响下,大学和大学人愈发失去了对教育和学术使命的信仰、对生命和生活幸福的关怀以及对精神与道德高尚的关切,教育与人发生倒置,导致大学形销骨立,学术之树枯萎,教育使命淡漠,校园文化沙化,人陷入异化。

### (四) 熟人社会文化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其典型特征表现为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以血缘或亲情关系为依据,以宗法礼教和传统权威为手段。熟人社会组织既通过各种规章要求来维系等级化的秩序,同时隐性的规范规则又在实际上主导着组织运行,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sup>[13]</sup>。而现代社会组织则强调正式化、制度化、规范化,直至民主化、科学化及法治化,要求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以此实施组织管理。无疑,现代大学组织的演化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我国大学在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摆脱传统管理的束缚,走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本化等现代管理思想。但传统的熟人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仍深刻影响着大学,大学有法不依问题普遍,“潜规则”盛行,人治化同行政化、官僚化相互强化,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文明与组织科学、管理科学是相悖的,与大学的组织属性及其逻辑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严重阻碍了我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向和大学办学能力的提升。当然,这种文化形成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治理传统,在推进大学现代化过程中,在追求大学新文化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改造,值得深思。

以上四种大学文化样态相互强化,成为一个生态性的文化系统。大学、学术、教学的工具化使得大学及大学人逐渐丧失价值理性与反思能力,以追逐个体进阶为全部意义的同时,忽略了客观规律,淡漠了真理与教育使命;官僚集团通过权力系统进一步损害了大学的尊严,篡改了大学以及教学和学术的本然性逻辑,以服务于权力与利益意图,从而强化了大学的工具主义文化;熟人社会文化为官僚集团提供了强化利益基础的粘合剂,并与权力一道成为实现集团意图的有效工具。大学的异化,本质上是文化的异化。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异化的大学文化实际上造成大学制度的危机,并导致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去行政化之难、教授治校之难、权力分界之难、教学创新之难、办学模式转型之难等一系列困境,既有制度设计的原因,更有文化阻遏的渊源。所以,一个合法性基础并不牢固的大学制度体系既产生了变革的需求,却又存在变革的困难。因而大学制度的创新必然要求加强文化治理,建构大学新文化。

## 四、新文化的建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之基

### （一）大学建构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1. 构建大学文化需坚守大学传统。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发现，“在1520年以前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现在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有85个组织，此中中有70所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sup>[14](P164)</sup>。大学能够基业长青，在于大学始终维系着从其发轫起就具有的一种稳定的生态调适能力，以持续适应环境变化。大学是人类创造的特殊机构，人类对大学的需求无外乎对知识、人才、文化、技术的需求。大学只有持续满足人类的需求，才能够获得存在的空间。为此大学必须固守以学术为志业、由科学达致修养、思想自由而兼容并蓄、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道、崇尚大学自治和尊重教授治校等基本的理念、精神、原则。从大学发展史来看，正是这一系列理念、精神和原则，促使大学从初生为一个独特社会机构的雏形，直到如今演化为一个具有坚固的社会基础的社会轴心机构。唯有坚持这些原则，大学才能以知识传承与创新为方式，解决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难题，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进步提供智力服务，也才能确保大学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教育、学术和文化组织的属性从而能够具备对以上诸种价值追求的热情和能力。也即，以上大学理念、精神、原则就是所谓的大学的逻辑，其使得大学具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和持续进化的可能性。正如张维迎所说，大学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具有“持续的核心理念”、“宗教式的组织文化”<sup>[15](P112)</sup>。

2. 建构大学文化应反映时代需求。现代大学历经千年留存至今，还因为大学在坚守中不断改造传统，从而促成了大学的进化。若一味固守大学传统，终会为时代所抛弃。英国牛津、剑桥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但在19世纪前后，随着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兴起，两所大学却陷入生存危机，究其原因，正在于其固守教会主义和古典人文教育传统，悖逆了社会发展和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需求。19世纪后半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变革传统，包括取消入学者宗教测验、引进自然科学课程、尊重现世主义、关注产业需求等，从而重新焕发生机<sup>[16](P17)</sup>。随着社会变迁而主动革新思想、自觉调适自身角色，这是大学不断进化的根本促因。因此，德里克·博克强调大学要“走出象牙塔”，克拉克·克尔指出现代大学已不再是“居住僧侣的村庄”和“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而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正是在新思想的指引下，美国在以德为师的同时并未忽视大学的社会责任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大学模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这意味着，我国在建构大学新文化进程中，强调大学独立却要理性认识国家干预的价值，强调教授治校却要反思现代大学作为复杂系统对职业化校长和专业化管理的必然要求，并要强调作为一个正式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管理。也即，大学新文化的建构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新的时代思想和精神为导向改造、优化大学传统，又以大学传统中永恒的价值为立足点来审视、选择新要素。如此，大学才能创新，其基业才可赓续。

3. 建构大学新文化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大学有着共同逻辑，需要遵循世界通则，同时大学又是环境的产物，其改革无法脱离具体环境。千余年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几经转移，每种大学模式都是大学通则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例如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绅士教育传统、德国的理性主义思想和“文化国家”理念、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市场化思维，都是成就大学辉煌的根本。没有本土的创造，就不可能有大学的繁荣和引领世界大学发展走向的大学模式。同样，我国建构大学新制度、新文化，亦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第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认为，中国大学赖以与西方大学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大学模式的特殊性<sup>[17]</sup>。建构大学新文化，亟需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厘清对中国大学

文化产生实质影响的传统文化要素,探明那些能够真正成为我国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实现创新的积极性力量,对那些负向传统文化要素加以改造、摒弃。第二,我国大学新文化建构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民族复兴为导向的文化建设、国际化背景下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软实力建设等,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关切,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精神特质、价值旨归等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系统的方法与规范。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选择正确的文化建构范式,才能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优势。

## (二) 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四个重要维度

1. 树立学术本位主义大学观。学术创造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之源,学术本位反映了大学的内在逻辑,相应地,学术本位主义应是大学新文化建构的基本取向,是大学新文化的基底。所谓学术本位,就是大学职能发挥和拓展以其学术能力为基础,大学制度建构以促进学术创造为导向,资源配置、绩效评估、决策管理、行政服务等各环节俱以学术生产规律为依据,在大学里形成崇尚学术、尊重教授、服务教学、关怀学生的文化氛围<sup>[18](P10)</sup>。当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安身立命之基,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尊重大学的传统、大学的逻辑,大学才能建构起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为核心的制度规范,学术委员会才能获得学术主导权和自主权,教授才能因此而获得充分的治校参与权;行政管理也才能转化为服务型行政,进而大学“去行政化”才不至于沦为空话,如此才能建构一个符合大学组织要求的治理结构。尤为重要的是,学术本位主义文化将促使教师重新获得“大学主人”的地位,这符合大学从诞生伊始就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属性要求。从根本上说,学术本位主义大学观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经典大学理念的集中表达。只有尊重学术在大学里的本源价值,才能促成学术与行政间关系的本真回归,大学文化才能走出官僚主义的泥淖。而对真理的热情与崇尚,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亦有利于摒弃极端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大学观、教师观和职业观。

2. 复兴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奠定了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成为个人奉献于国家大业和人民福祉的理想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与责任感,此即家国情怀。大学为国之大器,其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知识分子亦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亦应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即,大学及大学人不仅仅是有着自身需求的个体,还有着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使命,这种家国情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爱的情感”<sup>[19]</sup>。今日之大学文化建构,以阐扬传统优秀文化为其一,而在大学成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大学教师以推动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的背景下,这种家国情怀显然对于大学更好践行其历史使命具有重要价值,这就提出了在建构大学新文化中复兴家国同构之文化传统、弘扬家国情怀的要求。阐扬家国情怀确保大学坚守国家公器的使命观,引导大学人践行民族和社会责任,这在狭隘功利主义思想极盛的条件,具有重要的价值匡正意义,即由单纯的“为稻粱谋”转变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更进一步,家国情怀是我国大学在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升与西方对话能力、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客观要求。

3. 强化法治化思维与程序公正意识。大学的法治化思维,即大学以提升大学管理效益和办学质量为目标,建立起完善的法规与制度体系,在大学办学的各个环节,各主体尊重法规章程的规制性角色,相信法治化的价值,自觉依法依规办事。大学是一个“松散耦合”组织,其基层组织如院系、学科、专业和项目,以及不同的教师乃至学生个体,都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和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是一个完全的自由王国甚至毫无秩序的“乌合之众”,大学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具有制

度化的内在要求,而现代大学越来越作为一个复杂组织,更要求实施学管理。而且,大学作为追求真理之所,在终极意义上担负着为人类立法、审视并反思人类自身的使命,故更需要强化其“法”与“公正”之逻辑。在我国大学治理中,大学规章体系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则依法依规管理的执行力十分欠缺。在熟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人情化、潜规则化、官僚化等管理模式、文化氛围都严重背离了现代组织科学与规律。如此,大学也就失去了人类立法与自我审视的资格,因为真理在狭隘的大学观中可能异化为少数人的选择。因此,强化法治化思维,完善规制体系,增强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祛除熟人化管理传统就成为大学建构新文化之要务。程序公正是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大学法治化文化构建中,尤其要加强程序化建设,在尊重大学学术与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在行政、管理、服务等领域加强标准化建设,突出程序公正,这是我国法治化制度与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内容。

4.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提出了价值与行动的方向和标准,其不仅反映了自由、民主、文明、公正的普遍大学精神,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机构,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而中国大学的文化建构必须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构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突出我国大学模式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方向,增强道路自信;有利于大学坚持党的领导和创新党的工作方式,增强制度自信;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增强理论自信;有助于大学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培养出具有文化自信并能创新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有助于大学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大学评价体系,摆脱“西化、美化”思维;有助于大学的办学、治理者坚持群众工作方法,从而改变官僚主义大学文化;有利于重建集体主义义利观,防止“精致利己主义”进一步泛滥等。近几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其中就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改革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我国特殊国情出发,还是从大学组织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出发,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必要的,是当前我国建构大学新文化的重中之重。

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所大学的灵魂<sup>[20](P3)</sup>。树立学术本位主义大学观,复兴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强化法治化思维与程序公正意识,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四个重要维度。明确学术本位主义的大学观,也就是以大学的逻辑为根据来改革大学制度,践行大学的精神与传统;复兴家国同构之传统,也就是要阐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立足国家和经济社会进步需要来变革体制机制;强化法治化思维与程序公正,适应现代化要求及教育现代化的趋势,依法治教才能落到实处,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机制才能发挥效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突出大学模式和大学文化的中国特色,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信仰有机融合到大学制度体系之中。只有建构起新的大学文化才会加快我国大学制度创新的步伐,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而这,也正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甘阳. 三评北大改革——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J]. 书城, 2003, (8).
- [2] 王洪才. 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模式[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2, (1).
- [3] 赵炬明. 精英主义与单位制度——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1).
- [4] 许纪霖.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J]. 学海, 2005, (5).
- [5] 张应强, 等. 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文化取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6).

- [6] [美]彼得·豪尔, 罗斯玛丽·泰勒.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5).
- [7] 罗燕. 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3, (6).
- [8] 薛晓源, 陈家刚. 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9] [美]W·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张建奇. 高校教师退出: 机制构建及其现实困境[J]. 山东高等教育, 2016, (6).
- [11] 刘雪梅. 功利主义的理论优势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J]. 学术月刊, 2007, (8).
- [1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13] 王尚银.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 (1).
- [14] [美]克拉克·科尔. 大学之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6] 贺国庆. 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17] 王洪才. 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猜想与反驳[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5).
- [18] 张继明. 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19] 郑富兴. 国家主义与教育借鉴[J]. 比较教育研究, 2014, (2).
- [20] 郭峰, 等. 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On the Cultur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ZHANG Ji-ming, YU Min

**Abstract:**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of sociology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culture and the institutio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new system design can obtain a sufficient legitimacy foundation. There are bureaucratism culture, parochial utilitarian culture, instrumentalism culture and special acquaintance culture and many other negative samples in 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e,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transforming system concept of modern university into institutional practice. Consequently, a new university culture is required to construct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the design of scientific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niversity culture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aradigm of “respecting the logic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foll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based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task of top priority to establish the college concept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to revive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family, to strengthen legalized thought and procedural justice consciousness and to implemen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ulture of university will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provide the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Double First-rat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university culture; culture governanc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责任编辑 白 浅)